

◀（上接 4 版）

惟克（Henry Sidgwick, 1838—1900）的《西洋伦理学史》（*Outline of the History of Ethics*, 1903 刊行）等。要之，评估王国维对西洋哲学的理解，并非拙文的要点；较具意义的是，一窥王氏如何根据他所接受的哲学，运用至其刻意选择的中国文化议题之上。

概言之，康德的“批判哲学”（critical philosophy）素被视为西方哲学的“哥白尼革命”（Copernican Revolution）。将原本形上学（metaphysics）奉为一种基本及普遍的论说，转化为一种“认识论”（epistemology）的利器，并超脱传统形上学本体论的形式。这一点王国维深得三昧，例如他曾断言：“汗德憬然于形而上学之不可能，而欲以知识论易形而上学。”（《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》）在重新阐释及评估传统中国哲学议题，他发挥得淋漓尽致。例如：他取法康德的“批判哲学”，以“先天辩证”（transcendental dialectic）的技巧，解消了传统中国哲学的命题。于是，他特别撷取中国哲学论述最多的三个概念：“性”“理”“命”，予以别出心裁的阐述，而成就了《论性》《释理》《原命》三种不同凡响的文本。在《释理》（1904）一篇，他说：

以“理”为有形而上学之意义者，与《周易》及毕达哥拉斯派以“数”为有形而上学之意义同。自今日视之，不过一幻影而已矣。

在《论性》（1904）文中，他复推衍道：

至执性善性恶之一元论者，当其就性言性时，以性为吾人不可经验之一物故，故皆得而持其说。然欲以之说明经验，或应用于修身之事业，则矛盾即随之而起。

显然他所持的高见，乃系得自康德的教诲——切勿混淆“形上”与“经验”不同范畴的论述。职是他特为表之，使后之学者勿徒为此“无益之议论”[按康德的“先验辩证法”本来的意旨即在揭露传统形上学乃是幻觉的谬思。Cf. P. F. Strawson, *The Bounds of Sense: An Essay on Kant’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* (London: Methuen, 1973), p. 33.]。这在当时均是石破天惊的立论。惟得一提的，王国维于《三十自序》里，毫不讳言，尝因读《纯粹理性批判》（*Critique of Pure Reason*）至“先天分析论”（transcendental analytic），无法卒读，遂得中辍[王国维始读康德之《纯粹理性批判》的日期，他本人的记载略有出入，据《静安文集·自序》（1905），乃是1903年春（癸卯春）；然据《三十

自序》（1907），则是1904年。个人判断应以1903年春为是，盖原因有二：其一，系年清楚（癸卯），距1905年未远；其二，1904年起，王氏方得陆续刊出攸关康德与叔本华的文章。后得见赵万里《王静安先生年谱》，赵氏也案语：“《自序》或失之误记。”盖不谋而合也，惟理据则不同。可是在《论性》等几篇近作，他却能运用自如“先天辩证”的推论，去解析古典中国的哲学命题，其理解康德哲学的功力显然不可同日而语[请注意拙文所用的康德英译本并非王国维阅读的英译本。“transcendental analytic”“先天分析论”（或译“先验分析论”）乃是《纯粹理性批判》第一部分，而“transcendental dialectic”“先天辩证”（或译“先验辩证”）才是第二部分。循理说，必得先明了“先天分析论”，方能掌握“先天辩证”的妙处。但也有学者认为“先天分析论”才是全书最难理解的]。

此外，在《原命》（1906）一篇，虽然王氏假道康德的议题，但他已能有别于康德，而提出异议，谓“责任”的观念自有其价值，而不必预设“意志自由论”为羽翼。王氏的意见真确与否无关宏旨，但显现了他渐获自信，有所拣择，不复人云亦云了。之后，王氏竟一度认为：之所以读不通康德，乃是康氏其说“不可持处而已”[《三十自序》（1907）]。前后对照，王氏判若两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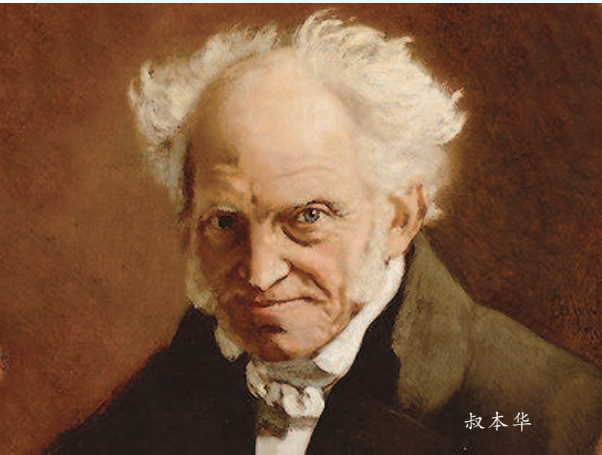
进而，他取叔本华的人生观作为立论，阐释了《红楼梦》的文学价值与意义，成为近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先声。甚至，叔氏的思想也渗透进王氏诗词的创作。后者也影响了他对教育的见解。王氏在对德国观念论的追踪下抵尼采（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, 1844—1900）。而叔本华恰巧作为康德至尼采的桥梁。

持平而言，王国维的美学观并非只是照着康德或叔本华依样画葫芦，就中国传统艺术的鉴赏，他提出“古雅”的概念，即有别于二氏“优美”（beautiful）及“宏壮”（sublime）的分辨，而深具历史文化意识，委实独具慧眼，卓有见地。

此外，果若王氏的确依循着研读康德，以思索中国文化相关的议题，这段期间他所刊行的代表作，恰恰透露了他阅读的轨迹。例如：《论性》与《释理》之于《纯粹理性批判》；《原命》之于《实践理性批判》（*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*）；最后，《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》（1907）一文之于《判断力批判》（*Critique of Judgment*）。它们所涉的议题均呈现了与“三大批判”一一对应的情况。



康德



叔本华

钱锺书（1910—1998）称誉王氏“论述西方哲学，本色当行，弁冕时辈”。盖非过誉之虚词。王氏攻坚康德哲学，直接苦读康德著作的工夫（王国维除了日文、英文，尚懂德文。他所阅读的康德著作主要为英译本和日译本，但也不能全然排除有参考德文原著的可能。参阅姜亮夫《忆清华国学研究院》，高山杉《王国维旧藏西方哲学书十种》），自然让他看轻该时梁启超便宜假道日籍，评介康德的泛泛之谈。他不讳言道：“如《新民丛报》中之汗德哲学，其纰缪十且八九也。”（《论近年之学术界》）行文意指梁氏至为显然。尤有进之，他竟致底议当时翻译名家辜鸿铭（1857—1928）迻译的文本，而讥斥“译者不深于哲学”，遑论深奥的康德哲学尤非其所长[《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》（1906），20年后，王国维自省“此文对辜君批评颇酷，少年习气，殊堪自哂”]。而康有为（1858—1927）、谭嗣同（1865—1898）功利的政治观与幻稗的形上学，更在他的讥刺之列。

于此，王国维心目中的哲学需得略加解析。他执着“纯粹之哲学”，而视其它哲学为杂糅之学。他曾抨击名重一时的严复“所奉为英吉利之功利论及进化论，不解纯粹哲学”，故难登大雅之堂。王氏主张知识之最高满足，必求诸哲学。他拳拳服膺叔本华的理念，谓“人为形上学的动物，而有形上学的需要”。故奉叔本华的形上学为

“纯粹哲学”的典范。并以哲学为“无用之学”，方堪与唯美的艺术相比拟，同为人类文化至高的结晶（《奏定经学科大学文科大学章程书后》）。职是之故，梁启超和严复辈汲汲于追求经世致用之学，自是为他所不屑。他直言：“欲学术之发达，必视学术为目的，而不视学术为手段而后可。”（《论近年之学术界》，显然此语改造自康德的伦理学的格言：“当视人为目的，不可视为手段。”）而国人“为学术自己故而研究之者”，且不及千分之一[《教育小言十则》（1907）]。

然而王氏的《红楼梦评论》虽以叔本华的人生哲学为立论，但在第四章却提出“绝大之疑问”；他质疑叔本华之说“半出于其主观的气质，而无关於客观的知识”。而于《书叔本华的遗传说后》一文中，复大肆抨击“叔氏之说之不足恃，不特与历史上之事实相反对而已”，且非由“其哲学演绎所得”。其不满之情宣泄无遗。对照早些时他对叔本华思想拟“奉以终身”无比的崇拜（王氏在其1903年9月所作《叔本华像赞》，至谓“公虽云亡，公书则存，愿言千复，奉以终身”），判然两样，此不啻埋下日后告别哲学的伏笔了。

1907年7月，王氏撰有一文，仿若“告别哲学”的前奏。他坦承疲于哲学有时，因为哲学上之说“大都可爱者不可信，可信者不可爱”。依王氏所言，所

谓“可爱者”，便是“伟大之形上学、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”，而“可信者”则是“知识论上之实证论、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”。析言之，在哲学上，便是德意志观念论（Idealism）与英国经验论（Empiricism）的对垒，而王国维的思维恰巧拉扯在二者之间。他不讳言自己酷嗜乃是前者，但求其可信者则在后者。他坦承“知其可信而不能爱，觉其可爱而不能信”，乃是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。王国维复对近年西方哲学的发展感到失望，他举德国芬德（W. Wundt, 1832—1920）和英国的斯宾赛尔（H. Spencer, 1820—1903）为例，“但集科学之成果或古人之说，而综合之、修正之耳，此皆第二流之作者，又皆所谓可信而不可爱者也”。虽谓“哲学家”，实则“哲学史家”罢了。循此，王氏忖度，以个人的才性和努力至多也只能成就一个“哲学史家”，而“哲学家”则不能，是故颇觉沮丧。可是他犹未绝望[《三十自序二》（1907），王国维自我的评估却不幸成为之后中国哲学发展的预言。贺麟即说，近50年中国哲学的发展非原创性的哲学。参见贺麟《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》。又，蔡元培《五十年来之中国哲学》]。

要之，王氏自觉个人的禀性“欲为哲学家，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；欲为诗人，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”。显然自相矛盾。他虽有如是自我的反思，但犹未绝情于哲学和文学。依其1907年7月《三十自序》的文末，王氏犹抱一丝的寄望，祈求老天赐予“深湛之思，创造之力”，俾便“积毕生之力，安知于哲学上不有所得，而于文学上不终有成功之一日乎”。观此，王氏尚亟盼求得两全其美。因是于诗词的创作之余，他拟从事第四次，也是最后一回攻读康德哲学。

有趣的是，当王国维徬徨于“哲学”与“文学”两条分歧的叉路时，结果他并未像诗人弗罗斯特（Robert Frost, 1874—1963）选择了一条人迹罕至的荒芜之路[罗伯特·弗罗斯特《未曾走过的路》（*The Road not Taken*）]，而是另辟蹊径，以供日后他人追踵的坦途——经史研究。

原来事情的发展，并未从王氏所愿。真正对哲学的致命一击与意向的骤变，尚俟罗振玉的介入与劝导。然由攻读西洋哲学跳跃至罗氏建议的经史研究，王氏尚有一段文学创作

（下转 6 版）▶